

泰山研究院文丛



主 编：王雷亭

副主编：陈伟军 周 鄠

碧霞信仰与 泰山文化

周 鄠 著

五岳独尊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 级出版社 全国

泰山研究院文丛



主 编：王雷亭

副主编：陈伟军 周 鄠

碧霞信仰与 泰山文化

周 鄠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碧霞信仰与泰山文化/周郢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209-08995-1

I. ①碧… II. ①周… III. ①泰山—文化研究—文集 IV. ①K92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0876号

碧霞信仰与泰山文化

周 郢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开 (169mm×239mm)

印 张 24.5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

印 数 1—1000

ISBN 978-7-209-08995-1

定 价 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 总序 |

“庄严神圣的泰山，两千年来一直是帝王朝拜的对象，那里的艺术杰作与自然景观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泰山一直是中国艺术家和学者灵感的源泉，象征着古代中国的文明和信仰。”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以这样的评价，将世界首例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荣誉授予五岳之首的泰山。2006年，泰山又入选世界地质公园。泰山以其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雄伟壮丽的自然景观、独具特色的地质地貌，给世界贡献了一种特殊的、独一无二的遗产。

泰山文化资源异常丰富，关涉政治、历史、经济、社会、宗教、民俗、艺术、教育、自然景观等多个方面。自先秦以降，历代帝王不乏登封祭拜者，文人墨客亦喜览岱抒怀，更兼民间信众朝山进香络绎不绝，儒释道三教争相建坛设教等，历史文化活动的绵延不绝，逐渐积淀、建构出博大精深的泰山文化。

2005年，泰山在《中国国家地理》组织评选的中国最美十大名山中名列首位，组织者的定位是“泰山：华夏的图腾”，并给泰山如下评语：“山不在高，在于文化积淀的厚重；泰山久参与社会，深入人心，超越观感，成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地标。深具儒家风范者，首推泰山。”这一定位和评价深刻地揭示了泰山文化的核心价值。纵观历史，许多古老的文明都喜欢以一巨物隐喻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如欧洲的奥林匹斯山、日本的富士山、埃及的金字塔等，无不成为民族国家的象征。而被誉为“天地间一巨物”的泰山，恰可以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象征，并为这一古老文明的复兴加冕。在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符号体系中，山岳本就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宏大的山岳景观，表征着国家的持久、稳固和尊严。在华夏民族丰富的山岳体系中，泰山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山体。

泰山学院以泰山命名，担负着传承、研究和光大泰山文化的神圣使命，泰山学院所属泰山研究院即是泰山文化研究的专业机构。1996年，原泰安师专各系部先后成立了泰山文化研究所、泰山旅游研究所、泰山名人研究室、泰山文献研究室等四个专门研究机构；1999年，为了提升泰山文化研究的品味，凝聚学术力量，学校又整合四家研究机构成立了泰山研究中心；2006年，又在研究中心基础上改制为泰山研究院。2011年，泰山研究院与中日韩三国相关学术机构在韩国晋州共同发起成立了东亚山岳文化研究会。2011年6月，泰山研究院入选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经过众多学人积年的努力，泰山研究院不仅取得了不菲的业绩，而且渐趋形成了泰山历史文献、泰山宗教民俗、泰山文学艺术、世界遗产等多个相对成熟的研究方向，并组建了一个学术结构合理、规模庞大、学科种类相对完善的泰山研究组群。

为给泰山文化研究团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园地，给泰山文化研究打造一个高品质的交流平台，泰山研究院决定不定期组织出版“泰山研究院文丛”。文丛的撰写编纂，悉从学术至上原则，恪守学术规范，不强加规划，不人为促成，成熟一部推出一部，成熟一批出版一批，以切实推动泰山文化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正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泰山研究院文丛》即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推出的泰山研究系列新作，代表了泰山研究的最新成就。最后，惟愿泰山文化研究日新月异，早成大业！

泰山研究院

2017年1月20日

| 序 言 |

泰山周郢将他的新著《碧霞信仰与泰山文化》送来，请我作序。我基本上不为他人著作作序。原因在于，自己对于对方研究的课题没有研究，写些虚浮应酬的文字，既贬低了他人著作的成就，本人也出洋相。敬谢不敏，实为藏拙。然为周郢新著作序，我很早就爽快地应下了。这是因为，从周郢十几岁时的习作，到他已经出版的泰山学系列著作，我基本上都读过了，有话可说且有话想说。至于这篇“序”从何下笔？——我想到的是“有志者事竟成”，要向有志于学的青年学者学习。

获知周郢之名，大概是在1980年代初，那时我回乡探亲，萧宝万（已故）兄相告：我们泰安出了一个“神童”！说的就是周郢。那时周郢大概才10岁，随他姥姥与舅舅一起生活。“文革”中的小学生除了唱“语录”歌，不过学点加减乘除，而周郢却自幼便爱读杂书，可以接触到的任何“书”，哪怕拣到几张有字的纸片，也要弄个明白。宝万兄做过中、小学教师，熟悉地方掌故，也有些疏狂，他说：“这孩子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

后来，不断听到周郢的消息：他初中毕业后，没有上成高中，却已开始研究泰山并发表文章。后来听说他被聘参加编纂《泰山志》，发表的文章更多了。我在泰安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和《泰山研究论丛》上，陆续读到他写的多篇关于泰山文史的论文：发掘资料，提出问题，举证论述，条分缕析，文字简洁，已超过一般大学生写作学术论文的水平。《泰山志》完成，他这个“临时工”被辞职，回到父母所在的陕西汉中，但没有放弃学术研究的追求。当地文化部门发现了这个人才，将他正式录用安排到文化馆工作，后来泰安师专（即今泰山学院）又聘请他来做专职科研人员。他回到故乡泰山的怀抱，才情学问得到充分发挥。学术著作一部部相继出

版，获得国内外学界的承认，并被破格评为副研究员。

我们是如何直接联系上的，已经记不清了。2006年我读到周郢的《泰山志校证》，为之震惊，特地写了一篇短文推荐——《古籍整理的新硕果：推介周郢〈泰山志校证〉》^①。在《光明日报》发表时，编辑删去了最后一段文字，现补录于此：

笔者离开故乡泰山已五十多年，从事中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应故乡的朋友和老同学之约，对乡邦文献亦偶作介绍。1985年曾作读书笔记《张五典的〈泰山道里记〉》，误张氏短文为一专著。周郢在其所著《泰山历史纪年》（泰安市档案局1990年版）予以正误，因结为忘年交……周郢的这部新著出版，喜见其学术研究功力的成熟。时下年轻学者多不愿做此类耗时费力的古籍整理工作，而周郢却以八年之功，完成此巨帙，嘉其勤勉，因作短文推介。

周郢走的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何以能“成才”？我觉得首先在于他对文史知识敏锐的感知和痴情的追求，前者来自先天的蕴涵，后者出自个人的性情，我认为这就是一般所说的“才情”。其次，周郢在成长过程中，虚心向学，多问多思，因而得到许多前辈的指导，很快就掌握了治文史之学最基本的实证方法。其三是他“虽以做泰山文史为主，但始终保持当代学术的前沿意识和通观文献的全盘眼光”，“立足泰山基本史料的整理和发掘，充分尊重和吸收前人研究泰山的成就，充分利用当代中外学术在各个学科所取得的成就，全方位的关注泰山研究，从整体上将泰山研究提升到当代学术的先进水平”（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语^②）。

作为看着周郢一路走过来的人，我开始也曾同某位朋友商量过，如何将周郢以“考研”的方式纳入学术体制内，结果是“此路不通”。其实，周郢于1999年出版的二十多万言的《明代名臣萧大亨》一书，曲阜师范大

^① 车锡伦：《古籍整理的新硕果》，载《光明日报》2007年5月2日。

^② 陈尚君：《泰山与中华文化·序》，载周郢《泰山与中华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2010年版。

学骆承烈教授在“序”中论其特点：第一，传、谱配合，体例妥当；第二，资料丰富，考据精审；第三，史、论并重，卓有创见。^①我想当时如果拿到某个高校去作为博士论文答辩，也不见得就不能通过。

从周郢的成长过程，进而联想到自己的求学、教书和从事学术研究经历，颇多感触。我是“文革”前高教部1960年在直属重点大学首届正式招收的“副博士”（硕士）研究生（1964年4月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毕业时，“副博士”学位已经“革”掉了），接触过恢复学位制以来各高等学校培养的许多“博士”“博士后”。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都有一定学术水平，作为专著出版以后，许多人却找不到继续开拓研究的课题。原因是什么？我思考过这个问题。其中的关键大概是，五十年代以来高等学校的教学研究体制，就不要求“博”。“又红又专”，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来的口号；八九十年代，我所在的学校主管研究生教学的科研处处长要求研究生教学“规范化”。因为我在研究生班读的是“中国文学史专业”，专业方向是“中国戏曲史”，所以，直到退休，我啖饭的本业是“元明清文学”教学、指导“中国戏曲史”硕士学位研究生。突破此范围，我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成果都被视为“不务正业”，所以，尽管1996年我申报的《中国宝卷研究》列为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96AZW020），1997年也要按章“退休”。讲这些题外话，想说明的是：我们的学术体制，不可能培养出周郢这样的“人才”。“有志者事竟成”，周郢以他的才情和勤奋，转益多师，不受“专业”的束缚，视野广阔，涉猎多域，从泰山文献整理开始，脚踏实地，走出了一条不断出成果的“大文化”研究之路。

自然，正如陈尚君教授说的：较之许多自学研究传统文史的青年才俊，“周郢君是很幸运的”。他的“幸运”，就在于关键时刻，不断遇到了赏识和破格提拔他的“伯乐”。因此，我还希望，“从整体上将泰山研究提升到当代学术的先进水平”的周郢，能够快一点迈过“中学生、副教授”（借

^① 骆承烈：《明代名臣萧大亨·序》，载周郢《明代名臣萧大亨》，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启功先生句)这道坎儿,在引领泰山学的研究和扩大泰山学的影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说到“泰山学”,也有一个如何纳入现行学术体制的问题,已故乡贤徐北文先生(1924~2005)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我们拟议的泰山学,应以泰山与华夏文化、中国历史的关系作为研究范围”^①,就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具体的说,泰山学是在“中国历史”学科下、以“区域史”(“名山史”)为基础的综合研究科目。虽然目前国内实际上已经形成一支泰山研究的队伍^②,已经出版了许多具体而实在的研究成果;泰安市与泰山学院也各自成立了泰山研究院,建立了泰山学研究的平台。周郢本人更登上过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讲坛,获得过多项省社科成果奖。但就我所知,目前泰山研究计划(包括周郢的课题)尚没有一项被纳入国家级社科规划。也就是说现行国家社科研究的体制中,泰山学尚无一席之地,如何实现零的突破,还有待于泰山研究学者的共同努力。^③

在同周郢的通信中,欣知他计划在五年内完成百万言的《泰山编年通史》(已成稿多半)^④。泰山向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圣山”“国山”,其山历史更贯穿了一部“二十四史”。以周郢三十年研究泰山历史、政治、文学、艺术、民俗等等诸方面的积累,我相信他完成的这部《泰山编年通史》将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名山史”。这是完全可以申请国家社科规划课题的,建议有关方面大力推荐;同时,希望周郢不要再让那些“学会邀约、师友雅命”来影响自己的研究计划,而是使其适应自己的研究计划,即作为完成上述课题的组成部分。

周郢在本书“后记”中提到在他写作泰山碧霞元君考论的过程中,得到了我的“悉心指导”。这样提法,令我惭愧。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

^① 徐北文:《建立泰山学刍议》,载《泰山研究论丛》第一集,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② 周郢:《泰山文化研究的回顾和前瞻》,载《泰山与中华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2010年版。

^③ 新近获知:周郢《泰山编年通史》已列入“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号16FZS050)。——校中补记。

^④ 关于周郢此书的内容与体例,可参本书中《泰山编年通史·编纂大旨》一文。

始，在业余研究同民间信仰有关的古老的民间演唱文艺，其中主要是宣卷和宝卷。由于自幼便在家庭和社会氛围中感受到泰山“老奶奶”的“庇佑”，所以在 1990 年 9 月应邀参加第一届国际泰山学术研讨会时，便用手边的材料，写了《泰山女神的神话信仰与宗教》^① 一文应付。此后除了写点读书笔记，并无力作深入的研究。当周郢就其碧霞元君和其他泰山学考论来函相商时，我只能就研究题目能否成立，立论是否充分，提出参考意见。

读周郢有关泰山学的论著，每令人眼界大开。这部《碧霞信仰与泰山文化》有关碧霞元君的论述中，其关于妈祖“碧霞元君”封号的考证，泰山玉女与巫山神女关系的试探，清廷遣祭元君圣诞史实的解析等等，都使我耳目一新。兹举妈祖一事：妈祖是古代倍受崇信的海上女神，相传被明代皇帝敕封为“碧霞元君”，而众所周知，“碧霞元君”乃是泰山女神的封号。那么，敕封妈祖为“元君”之号是否真有其事？其加封之号与泰山女神有何关系？这一历史悬疑，即被周郢揭开——《明崇祯朝敕封“碧霞元君”考辨》一文据新发现的史料证明，崇祯帝确曾加封过“碧霞元君”，但所封的不是妈祖，而是泰山娘娘。其引证康熙三年（1664）《颜神镇志》卷三《飨祀》记载：“明季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二十三日，敕谕道经掌坛官梁之洪虔贡香帛，前往东省泰山设醮，恭告行礼，加封群神：天仙圣母青灵普化慈应碧霞元君……”为了印证镇志这一史实，周郢又在泰山碑记中查获了一则“铜证”——岱顶碧霞祠明末所立《敕建泰山灵佑宫记》铜碑题名中，恰恰出现太监“梁之洪”之名，遂可推断《颜神镇志》所记崇祯敕封泰山碧霞之事确属信史。这一新史料的发现与考订，极大推进了妈祖信仰与泰山文化的研究。自然，也可以对周郢的结论提出异议，那就必须博览更多文献，找出可以否定他的论证的新资料。

如果有所补充的话，我觉得周郢对碧霞元君信仰在明清民间宗教中的巨大影响尚缺足够的关注，其他关于泰山宗教研究的论著也大都回避了民

^① 收入《泰山研究论丛》第三集，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现已修订收入拙著《中国宝卷研究》为第四编第一章“东岳泰山女神——泰山老奶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33 ~ 449 页。

间宗教的问题。我在研究宝卷的过程中，感到自明代以来泰山地区便盛行民间宗教，碧霞元君（天仙圣母、泰山娘娘、泰山圣母）被纳入民间宗教无生老母的信仰体系，有极大的影响。现在流存下来的直接以碧霞元君为题的明清宝卷就有四种，为研究碧霞元君信仰和民间宗教提供了大量信息。如碧霞元君与东岳大帝的关系，《灵应泰山娘娘宝卷》称泰山娘娘“辖天齐管十王总管阴间”（天齐即东岳大帝），说明在民间宗教家（自然也是广大信众）的观念中，东岳大帝也被视为泰山娘娘的“麾下”。直到近现代，泰山地区仍盛行民间宗教的活动，并传播到各地。山东平度大泽山泰山老母行宫日照庵现存清代至民国“香会碑”百通，其中民国《高山无生老母会碑》中，便说这个“高山无生老母会”来自泰山。自然，开拓泰山民间宗教的研究，需要田野调查，需要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先备案在此吧。

行文至此，还是回到开头的话：为周郢作序，我想到的是“要向有志于学的青年学者学习”。我已老朽，“发挥馀热”，就是尽量能给青年学者以支持。学术的发展，后来者必然要超过前人。古人说“后生可畏”，我理解就是这个意思。

泰安车锡伦谨序

2016年10月于江苏扬州寒斋

| 目 录 |

总 序	1
序 言	1

上 篇 碧霞信仰考论

从巫山神女到泰山玉女	3
泰山碧霞元君祭：从民间祭祀到国家祭祀 ——以清代“四月十八日”遣祭为中心	20
明崇祯朝敕封“碧霞元君”考辨 ——兼论泰山娘娘与妈祖信仰之关系	39
明清之际的碧霞元君论 ——兼与彭慕兰先生商榷	52

中 篇 泰山史料新证

“泰山守”与“泰山司空”：秦代泰山置官考	78
羊祜作《四先生诗》考辨	85
陆游诗颂泰山封禅论	88
王重阳应“废齐武科”新证	92
新发现的徂徕山炼神庵摩崖考	96
蒙古汗廷与全真道关系新证 ——新发现的蒙古国圣旨（懿旨、令旨）摩崖简述	109
泰山“天仙照鉴”玉印考述	120
泰山碧霞祠明代铜碑考	130

陶山护国永宁宫与万历宫闱	
——兼述新发现的周玄贞史料	139
杜三策《使琉球疏》述略	145
明清易代中的泰安士人	
——《泰安施氏族谱》中相关人物史料考索	154
清宫所藏“多福砚”新考	166
《泰安赵相国印谱》考录	175
新史料揭开岱庙壁画时代之谜	188
泰山龙袍揭秘	196
山左河山笺底辨	
——评《续山东考古录》及其校注本	201
东平“水浒文化”的新诗证	
——新见两首咏宋江诗	211
范一双与泰山天外村	220
占绝名山是此村	
——泰山樱桃园山庄史述	225
泰安回族与泰山文化	236
泰山历代名画述略	248

下 篇 泰山文化综论

《泰山编年通史》编纂大旨	309
泰山诗歌的历史演进	
——读《全泰山诗》	322
从“神圣山”到“文化山”	
——唐宋金元时期泰山文化之变革	333
从庙堂到民间	
——明清时期泰山文化之转变	349
泰山为中华精神之山论	363
后 记	378

上 篇

碧霞信仰考论

碧霞元君是泰山著名女神，兴起于宋，明清时期深入人心，渐成为遍及全国的民俗信仰。本篇所收碧霞四论，分别对女神源出、祭祀、封号、论说等几个方面的问题予以新探，提出不同前人的一家之言。

《从巫山神女到泰山玉女》：楚辞中的巫山神女原型，与泰山有着密切关系——最早见于经籍的巫山，落处于齐国泰山附近；巫山之名，又源自齐地的“巫儿”风俗；而传说中之巫山神女与巫儿相比，身世、行为、职司及男女遇合都非常相似。因此可以推断，巫山神女的原型之一，即是来源于齐地巫儿。后来随着楚国北进，齐地巫儿“远嫁”荆楚，但其神格依然在故乡部分遗存，后世出现的泰山女神玉女元君形象中，便依稀可见巫山神女的影子。

《泰山碧霞元君祭：从民间祭祀到国家祭祀——以清代“四月十八日”遣祭为中心》：泰山为碧霞元君信仰之祖庭，其祭祀活动最初兴于民间，随着其影响增大，明代开始出现皇帝派遣宦官诣泰山祭祀元君的事例。至清代将这种致祭制度化。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起，清廷定期于每年之四月十八日遣大臣赴泰山致祭碧霞祠，其制度

一直延续至清亡方告中止。考察这一礼制，有助于探明碧霞元君从民间信仰到国家祭祀的历史进程。

《明崇祯朝敕封“碧霞元君”考辨》：清初出现的《天妃经》，称明崇祯朝曾加封妈祖为“碧霞元君”。此事屡经学者考辨，多认为出自道士假托。今以新史料佐证，崇祯帝敕封元君神号确有其事，只不过所赐封者并非妈祖，而是泰山娘娘。其事在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所加之号为“青灵普化慈应碧霞元君”等。尔后道士为争取信众，潜将崇祯敕封泰山娘娘之号移于妈祖，遂造成后世两神名号混淆的一重公案。

《明清之际的碧霞元君论——兼与彭慕兰先生商榷》：明中后期与清前期，围绕着泰山女神碧霞元君信仰，曾产生巨大的争辩。持异议者认为元君之祀神非正神，祠属淫祀；凌驾岳帝，乾坤倒置；而由此产生的香会活动，更是伤风败俗。支持者则多方论证，力辩碧霞是“正祀”而非“淫祀”。也有一部分论者认为，元君信仰虽有淫祀性质，但应对其信仰者进行疏导而归之于“正”。入清之后，面对激烈的争论，康、雍、乾三帝各有“元君论”昭示臣民。其中乾隆帝认为古代祭祀中视地为母，设为女像，碧霞元君即产生于此，为元君信仰的合法性找到依据。当代美国学者彭慕兰提出，清嘉庆之后，碧霞元君失去了大多数菁英的供奉，而乾隆本人从未到过碧霞祠。本文则以大量的史料证明嘉庆之后，碧霞元君并未失去大多数菁英的供奉，乾隆本人多次亲祀碧霞祠，而清廷对于泰山碧霞祠的国家祭祀活动一直持续到1910年。

从巫山神女到泰山玉女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自战国时期楚国赋家宋玉《高唐》《神女》二赋问世之后，这一中国文化中的“维纳斯”，便挟着高唐朝云、巫山暮雨，时时回荡于多彩的文学画廊之中。而追溯这位爱情女神的文化原型，却与东方神岳泰山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关于这一点，早为清代地理学家叶圭绶、现代楚辞专家孙作云所发现，但遗憾的是，两位学者之独到创见却未引起学界的应有关注。当代两篇研究述评——魏崇新《近年来高唐神女研究述评》^①、彭安湘《七十余年来高唐神女研究述评》^② 对其说均未述及。为此，本文便拟在前辈方家的论述基础上，对巫山神女与泰山玉女的渊源，作一番梳理与解读。

一、“高唐本自此高唐”：巫山神女形象源出泰山

《高唐赋·序》中写道：“（宋）玉曰：昔者先王（楚怀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又云：“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

这一朝云暮雨之巫山，后世多以巴东三峡之巫山当之。《文选注》引三国张揖《汉书注》云：“巫山在南郡巫县。”^③有当代学者认为：“《史记》所说

① 魏崇新：《近年来高唐神女研究述评》，《文史知识》1993年第2期。

② 彭安湘：《七十余年来高唐神女研究述评》，《中国楚辞学》第十三辑，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③ [唐]李善注：《昭明文选》卷一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8页。

的巫郡、巫山就是三峡巫山……高山大江，套峡连绵，瀑布高悬，只有三峡巫山才符合《高唐赋》的描述。”^①

将《高唐赋》中所描绘的巫山，指实为三峡之巫峰，自是情地恰切。不过若追溯其名之原，却还有更早的出典——《左传·襄公十八年》：“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

这便是最早见于经籍的“巫山”之名。那这座巫山落处何地呢？晋杜预注云：“巫山，在卢县东北。”又《水经注·济水注》：“京相璠曰：巫山在平阴东北，昔齐侯登望晋军，畏众而归。师旷邢伯闻鸟鸟之音，知齐师潜遁。”宣统《山东通志》卷二十三《疆域志第三·山川》备引诸说云：“巫山，在（肥城）县西北六十里。《左传·襄公十八年》：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注：山在卢县东北。《水经注》：巫山在平阴东北。《太平寰宇记》：一名孝堂山，相传汉孝子郭巨葬母于此，故名。《齐乘》：清河北经巫山，俗讹为无儿山（《大清一统志》）。谨案：……今巫山之上有石室，耆老言郭巨葬母处，世谓孝子堂。此山距肥城、长清两县界，隶长清者在孝里铺东。故杜注谓‘在卢县东北’也。”又光绪《肥城县志》卷二《古迹》记云：“孝里：在县西北东张社孝堂山下，因汉孝子郭巨避难来此，人皆感之，遂名其里曰孝里，山曰孝堂。按：孝堂山一名巫山，《春秋传》：晋师伐齐，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即此。因山有孝子堂而改今名。”其山为泰山西麓之支阜，春秋时毗邻齐之高唐邑（《左传·襄公十九年》出现此邑名，杜注：“高唐，在祝阿县西北。”故城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伦镇西境），今属济南市长清区之孝里镇。

另据元人于钦《齐乘》所记，这座巫山又别称为巫儿山。据其推考，巫山之名，乃来自齐地之“巫儿”（主祠女）。其书卷五《风土》论云：“平阴广里有巫儿山，岂以主祠女得名邪？”^②

关于“巫儿”，《汉书·地理志》中有一段记述，久为史家所引述。其书云：“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姐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关于此俗，社会学家认

^① 瞿明刚：《三峡诗学》，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105页。

^② [元]于钦撰，刘敦愿等校释：《齐乘校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05页。